

【区域开放与合作】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贺慧 刘书明

摘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逻辑演进上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适应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然选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各地要因地制宜,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内外双循环体系。目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仍存在一些约束条件,因此在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上,应着力打通堵点、破除制约因素,宏观层面应借助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契机,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中观层面各区域既要一体化协作“抱团发展”,又要根据自身禀赋确定差异化的经济循环战略目标;微观层面应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效结合,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3)02-0138-09 **收稿日期:**2022-09-24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高质量发展的黄河流域绿色增长绩效测度及其财税支持政策创新研究”(21BJY075);2021年山西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区块链医疗保险平台构建及在扶贫中的应用研究”(202104031402120)。

作者简介:贺慧,女,山西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经济学院博士生,山西金融职业学院讲师(太原 030000)。

刘书明,男,山西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太原 030000)。

2020年4月10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发展新思路,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适应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然选择,是我国迈向新时代走向新征程道路上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发展,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对国际

循环的依赖度逐渐降低,2019年贸易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分别为17.52%和14.56%,2020年二者分别降为8.97%和7.15%,已远不及入世前的2000年。2010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升,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已具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利条件。本文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和历史演进,深入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动因,并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典型城市为例,探讨新发展格局构建实践面临的现实约束,进而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以期打通堵点、破除制约因素,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逻辑起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布局,是基于内外经济循环的基本理论提出的,为更好地指导各区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实践,有必要深入理解其理论内涵及逻辑演进历程。

(一)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对经济循环进行了基本解释,即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有效衔接、循环往复,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循环体系会拓展到世界范围,形成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双循环”其实就是经济的内外循环,任何一个有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运行必定是双循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格局也早已是双循环格局(贾康,2021)。新发展格局中的“新”主要体现在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进而对已有的国际大循环发展做加法,使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从经济发展指标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10276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①。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12551美元,突破了1.2万美元^②,国际经验表明进入这一收入水平,需求结构将逐步过渡至以内需为主。

(二)新发展格局的构成要素

新发展格局中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循环重心发生了由外向内的转移,从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战略转变为通过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发力完善国内市场。一方面以扩大内需为主,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让各生产要素在各环节周而复始地良性运转,并保持螺旋式上升,从而畅通国内循环;另一方面,要促进产业链升级,提高供给质量,让供给与需求形成正反馈,实现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最终构建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和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则表明对外开放仍是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张倩肖等,2021),没有放缓更没有停滞,而是更高水平的主动开放。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循环的前提和基

础,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不断完善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循环,做大国内经济“蛋糕”,提高国际吸引力。国际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保障,借助世界贸易组织、“一带一路”以及自贸区等国际大循环平台,促使国内各要素资源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为国内大循环提供驱动力,主动引领国际规则的重塑及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推进更高水平深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因此,“双循环”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建设,它不是内外循环的割裂,而是“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国内循环本质上也是开放的,是与国际循环互相协调、联动发展的循环,是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开放,进而通过外循环壮大内循环的循环,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要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与需求侧管理联动结合,推动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螺旋式”动态平衡,有效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畅通,形成内部畅通循环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并将自身完整的国内大循环嵌入到国际循环中,实现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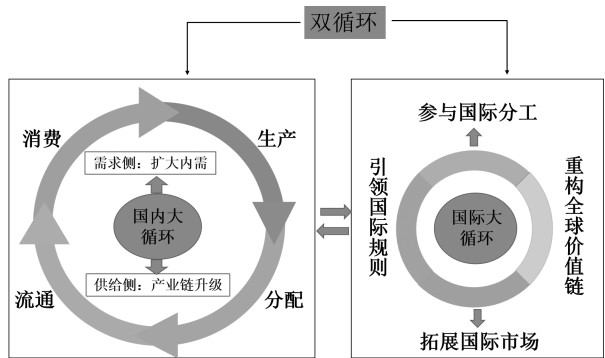


图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成要素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演进

梳理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呈现出以下5个阶段。

1.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阶段(1949—1977年)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扭转一穷二白的落后经济条件,重塑社会经济秩序,实现赶超式发展,我国除了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别无选

择,因此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形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内循环体系成为必然选择,这个阶段的循环格局也从客观上促进了低水平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2.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的经济发展阶段(1978—1988年)

改革开放初期,为激活经济主体,我国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市场化改革。对内搞活经济,引入市场机制,逐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一方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乡镇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快速推进,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充分发挥出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了城乡内循环的良好互动格局。对外实行开放,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打开了国际循环的窗口。邓小平同志鼓励经济特区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成果,先发展起来,从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内地发展,为后续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3.国际循环为主、国内循环为辅的经济发展阶段(1989—2006年)

改革开放持续推进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实现了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1988年,党中央组织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求沿海地区率先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并进一步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1992年,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浪潮,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改革以及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涉及财政、税收、金融多领域改革举措互相承接,促进改革进程不断深化。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央政府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提出“国际化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我国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也逐渐形成了“两头(市场和资源)在外、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在劳动和资源参与对外贸易的带动下,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社会财富也得到了稳步提升。“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同时也造就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4.国内国际循环并行发展阶段(2007—2019年)

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使我国经济呈现一种后发赶超式发展,但“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一方面,我国经济对出口高度依赖导致经济发展的动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内外需不协调;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劳动力要素供给缩减,土地、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原有的以国际循环为主导的发展格局难以为继。随着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战略的提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三去一降一补”等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举措的实施,我国不断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进入了国内和国际循环并行发展的时期。

5.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阶段(2020年至今)

从我国经济循环各发展阶段情形来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循环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本文用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来表示我国对国际需求和供给的贸易依存度,以此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循环依赖程度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知,1978—2000年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基本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01年加入WTO以后,更是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但是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逐渐降低,2019年贸易依存度已不及2000年,这也充分表明近年来我国对国际循环的依赖性逐渐降低,急需寻找新的循环方式来构建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因此,2020年,党中央提出“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思路,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图2 1978—2020年中国贸易依存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动因追溯

经济循环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逻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演进轨迹背后的逻辑动因,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

(一)宏观层面

受全球供求格局深刻演变、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全球经济衰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存在诸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对外贸易的增长引擎作用正在弱化。在世界经济受疫情冲击整体下滑的趋势下,中国采取行之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与适度的宏观政策组合拳实现了经济的复苏,进一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消费持续增加,内需也在逐渐扩大,因此客观上需要立足国内大市场、提高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风险防范能力,重塑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同时,中国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进一步加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揽子”扩大开放措施,如继续降低关税、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并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等,充分利用国际要素资源,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循环更高水平的相互促进。

(二)中观层面

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实现双循环的前提和基础,供给和需求又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两个基本点,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要求打破要素和商品市场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因此有赖于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为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提供平台,而非局部区域或省市级搞自我封闭的小循环。

供给方面,我国拥有健全的工业供应体系和强大的基础设施能力。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经形成工业门类齐全和超大规模市场的比较优势,具备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强大的基础设施能力能够快速布局新兴产业所需的要素投资,保障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和发展。因此,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和生产能力为再生产、经济结构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

需求方面,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和多元化的消费结构。2019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约有4亿人,拥有

全球最大、最具成长性的消费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可知,2010—2019年消费支出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度整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连续9年均超过50%,充分发挥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引擎作用。尽管2020年疫情冲击导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所下降,但疫情防控催生了新的消费方式,借助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各类APP直播带货的“宅经济”消费模式受到消费者的大力追捧,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使得消费市场不断增长,为扩大内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微观层面

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5G网络等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如智能终端、智慧医疗、在线教育、数字化营销等多种新型业务模式的涌现,数字经济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与日俱增,不仅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动能,同时也对家庭、个人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线办公、网络教育、智慧出行、远程问诊等已经成为更便捷的日常生活方式。《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近5.4万亿美元,占全球数字经济规模总额的16.6%,位居世界第二位,增速位居全球第一,因此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循环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同时,我国高精尖技术型人才储备不断增加,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据《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反映,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规模持续扩大,R&D人员全时当量^③从2016年的387.8万人年,增长到2020年的509.2万人年,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倒逼科技型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增强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有利于吸引全球先进要素落地,进而作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国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力和活力。

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实践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由于我国各区域呈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教育发展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等,因此,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

功能定位也各有差异。

(一)东部地区:长三角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长三角地区主要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从而实现了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应着重打造由长期依赖外需转为内外需兼顾的发展模式。为此,该地区通过要素和产业的集聚效应形成国内超大规模要素和产品市场,提高国内大循环的内生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利用国际要素资源,串联国内外市场,开拓国际市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从国内循环层面看,长三角“三省一市”(苏浙皖沪)依据各自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强大的国内大市场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上海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深度集聚核心要素,以技术研发、高端制造为主推动创新发展,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苏浙地区要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集群协同发展,在区域内打造合理的空间布局和产业链配套,形成规模效应,降低长三角地区的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安徽地区要不断增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以避免“虹吸效应”的产生,还应主动对接苏浙沪,形成梯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总之,要在区域内部构建产业链一体化新格局,从而形成供需高度匹配的市场集聚效应,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发展引擎。

从国际循环层面看,在中美经贸关系复杂多变及欧美国家对我国封锁日益严苛的国际趋势下,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抵御外部风险。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同时具备较高产业根植性和自主性,应作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窗口”地区,利用区位优势以及要素禀赋条件,通过上海自贸区等综合改革试验区平台,打造全球价值链枢纽和推进产业技术创新突破,提升国际循环的水平。

(二)西部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指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从国内循环层面看,基于“马阵跨阱”理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要形成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核极”,并以此“极”为动力源带动周边地区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快马拉慢马、慢马追快马的微观发展格局,以此发挥成渝地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进而推动实现西部地区全域性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一方面,成渝地区经济圈要培育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从而促进整个西部地区内需消费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加快成渝地区产业协同发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协同共建,形成一批高质量产业集群,为打造我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注入动能,进而满足国内大循环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循环层面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再加上较好的先天地理区位优势和相对完善的政策优势加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外开放程度迅速提升;同时,RCEP自贸协定的实施也促使整个四川地区加速向南开放,提升了西部地区全球金融、产业等高端资源要素的运筹能力,不断优化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在国际循环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中部地区:武汉都市圈和郑州都市圈

1.武汉都市圈

在新发展格局中,武汉提出要积极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以支点功能更好连通、服务、辐射周边地区发展,推动开放合作从“内强外弱”向“内外高水平互促”转变。

从国内循环层面看,武汉都市圈主要定位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致力于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创中心,打造内循环战略支点。发挥武汉市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效解决国外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大力发展体制机制灵活的“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既服务于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为展示创新成果提供平台,攻克科研产业“两张皮”难题;发挥工业门类齐全的优势,打造“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化”梯度科技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建成特色高端产业集群,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大规模发展,从而产生辐射效应带动城市圈升级发展。第二,充分释放内需潜力,为国内循环提供发展引擎。一方面,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资,充分发挥投资拉动内需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

面,进一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促进城乡之间的资金、人才、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挖掘和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第三,利用武汉重要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建设网络化、专业化、集约化、智慧化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提升武汉在国内大循环中的地位。

从国际循环层面看,武汉一直处于“内强外弱”的经济格局,对外开放程度相对不足。在新发展格局下,武汉充分利用自贸区、综保区等平台载体,扩大武汉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牢牢把握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充分放大枢纽效应、不断提升开放能级,将通江达海、上天入地的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通道和开放枢纽优势,为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中部省份搭建内陆“出海口”“空中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大动脉”,推动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并在产能合作、外资集聚、人文交流等领域进一步发挥支点撬动功能。

2. 郑州都市圈

郑州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城市,在自身高质量发展和中部崛起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目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从国内循环层面看,第一,打造中部地区消费中心,释放内需潜力。一方面,培育消费型城市,将人口优势转化为消费升级优势和内需市场优势,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发挥郑州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人口消费和集聚能力;另一方面,发挥文化大省的优势,大力发展文化旅游,通过旅游促进消费。第二,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加快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金融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第三,充分发挥贯通东西南北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建立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第四,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提高创新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从国际循环层面看,郑州作为新兴国家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一带一路”的主要交通枢纽城市,具有联通国内外的独特优势。要积极发挥自贸区作用,聚集国际中高端要素,推进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企业进驻,促进文化旅游消费国际化。第二,以跨境电商为抓手,深挖“网上丝绸之路”的潜力,赋能产业调整,打

造国际消费中心,提升对外开放层次,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充足动能。

武汉和郑州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功能定位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在地理位置上,郑州作为中原腹地,武汉作为九省通衢,二者都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有利于打造现代化物流服务体系 and 交通运输体系,为国内国际循环提供重要的枢纽支撑;其次,在科教资源上,武汉拥有更大的科教优势,更有利于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更高效地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移;最后,在拉动内需上,郑州都市圈除了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人口消费,还可以充分利用文化大省优势促进文化旅游转型升级深挖内需潜力。因此,各地区根据自身优势和禀赋资源,寻求适合自己的内外循环体系,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总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更好地解决各地区间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障碍,有助于破解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实践来看,各区域都是立足比较优势,通过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发挥能量外溢作用,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然而,各区域之间又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利用自身较高的风险防御能力,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的提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主体;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着力在重点领域实现创新驱动,并在增强自身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创新市场,提高对人力、物力等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助力西部地区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增长;中部地区致力于利用先天的地理优势发展物流服务和交通运输体系,为双循环提供动能支持。

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约束

通过对各区域示范城市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功能定位的梳理,可以发现在国内大循环层面,各区域主要通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解决“卡脖子”问题,通过产业集群实现规模效应及完善内需体系释放内需潜力等举措畅通国内大循环;在国际循环层面,各区域主要通过自贸区、综改区等载体,实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约束条件导致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落实力

度不够,缺乏有效抓手。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必须识别约束条件,找出堵点,对症下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带来不利外部条件

如今国际局势动荡,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全球范围内的疫情蔓延加速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美国作为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最多的国家,对中国的部分商品陆续加征关税,并对华为实施新一轮贸易限制措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也日益加强。这些因素都会使国际要素资源的引进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受到阻碍,同时也加大了我国出口贸易的难度,阻碍我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二)区域发展不均衡成为重要制约因素

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开放共享受限。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引起要素资源错配现象严重,导致地区市场的分割性和封闭性,形成区域之间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壁垒。即使在同一区域内,由于政府行政级别的差异,要素资源多聚集在行政等级高的城市,使市场呈现条状的行政性藩篱,形成区域内部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另外,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寻租和垄断现象严重,阻碍市场公平竞争。

同时,供给难以匹配有效需求的现象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我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温饱式消费转为高端价值性消费,然而我国产业链还长期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环节,国内相当一部分行业如电子产品、化妆品等企业的产品供给精细度不够,质量不高,再加之外国品牌的文化渗透使得越来越多的居民消费倾向于国外市场,对国内有效需求造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形成一定程度的“供给冻化”,供给和需求难以形成正反馈,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错配现象严重,不利于内循环消费市场的有序运行。

(三)创新能力不足掣肘内循环健康发展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局势下,唯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稳步复苏。因此,疫情过后,一些国家刻意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性成为可能,这种“去中国化”的做法在短期内可能会使我国一些出口型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面临订单急剧下降、资金周转

困难、营运成本剧增等问题,最终可能发生“断链”甚至倒闭。

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新基建投资的迅速扩张,传统的“铁公基”行业的发展红利期已经结束,市场已经日渐饱和,这种趋势下,传统低端制造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自身缺乏创新的动能,对国际市场形成“路径依赖”。尽管长期形成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使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条上不可或缺,但我们依然处在链条的中低端位置,在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生产上仍高度依赖进口,存在“卡脖子”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我国企业想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出现了生产要素“断供”,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

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

沿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梳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总结分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约束条件,旨在为了破解约束,打通堵点,消除市场分割,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畅通循环通道,实现内外循环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进程。

(一)宏观层面: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

202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利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契机,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打破市场壁垒,畅通要素流通,优化组合各生产要素来实现双循环战略。

国内循环方面,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原则之一就是立足内需、畅通循环。一是畅通生产循环,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二是畅通流通循环,纠正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错配,使供给和需求形成正向反馈,充分发挥消费对国内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三是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创新要素的合理集聚,发挥集群效应,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解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

的“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国际循环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在夯实国内循环的基础上,畅通国际供应链,形成对国际要素资源的集聚效应,打破要素壁垒和市场壁垒,有助于我国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更深层次地参与国际竞争。

(二)中观层面:各区域既要一体化协作“抱团发展”,又要突出差异化发展

第一,建立区域商贸循环体系。以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联动结合,形成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实现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路径。这就需要建立区域商贸循环网络,畅通区域循环流通体系,使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供给侧重在通过创新链打通产业链,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提高有效供给,精准对接需求;需求侧重在以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为基点,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使供给和需求形成正反馈,这种正反馈需要区域商贸循环体系进行链接,通过产业循环畅通经济循环,从而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二,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提升经济辐射能力。全国各中心城市要发挥好参与构建双循环的核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相互连通、错位竞争,实现共赢格局;各区域要牢牢抓住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 and 能量外溢效应,引领各自区域内的发达城市向全国中心城市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对标发达城市向上攀升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和高效协作。

第三,各区域要根据自身要素禀赋和资源优势精准定位各自实现经济循环的战略目标。东部地区应大力实施新驱动,以技术和资本提升为主,增加研发投入和科创力度,解决国内大循环中科技创新的“卡脖子”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循环的产业分工。中西部地区应将依托国内大市场,充分挖掘地区的消费和投资潜力,其中中部地区应着力解决资源型经济转型,破解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增加基础设施,结合新能源技术合理开发利用天然气、石油等资源,提升能源利用的附加值,实现经济高效发展。东北地区既要继续推进全面振兴,又要积极破界,突破现有的发展格局,寻求新的机

遇,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促进资源枯竭产业的更新换代,释放新的增长潜力。

(三)微观层面:政府与市场明确定位各司其职

1.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

在全球化产业链收缩的形势下,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内向化的产业集聚发展,尽快恢复全球产业链活力,形成以中国市场为核心、辐射全球的供应链新体系。这就需要政府有效发挥“看得见的手”的职能,集中力量推动我国产业链向国家价值链的高端延伸,重构并主导全球产业链。

第一,打造良好的企业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活力。通过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政策,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实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提高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从而调动员工积极性,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以提升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第二,优化财税政策体系,增强财税政策协同效应。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基础研究,集中力量补短板,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效应;落实好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加速发展,通过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盘活企业,畅通上下游产业链;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企业发挥创新驱动的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重点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科研攻关,克服对国外技术的路径依赖,化解“卡脖子”问题,补齐产业链条中不完善的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

第三,继续推进免税区、自贸区的快速发展,发挥其联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枢纽作用,引导消费者的资金由境外消费市场转向国内,为国内大循环发展做贡献。

2.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

第一,让科技引领企业发展。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推广应用,让科技型企业将先进技术嵌入传统行业,引领传统行业的发展,尤其可以瞄准传统行业痛点为其提供智能、安全、有效的服务,解决传统行业长期以来面临的瓶颈制约。

第二,借助数字赋能提质增效。在网络消费、智能消费等数字化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积极向数字经济产业转型,以便更好地对接数字化消费需求,不断寻找机会变革求新、转型发展。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新工具,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

本,使生产经营变得更为智能化和精准化,通过数字赋能助力企业实现创新升级和转型发展。

第三,通过出口转内销应对企业外需减少。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出口型企业的对外贸易规模势必会大幅度缩减,因此这类型企业应积极将出口产品转内销,通过媒体网络加大宣传力度打开国内市场突破口,拓展稳定的销售渠道。此外,企业要通过提升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创造更多个性化高端产品,提升国内品牌的知名度,引导消费回流。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住户调查主要数据——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01/t20220117_1826479.html, 2022年1月17日。③R&D人员全时当量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指R&D全时人员(全年从事R&D活动累积工作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90%及以上人员)工作量与非全时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之和。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问题[J].求是,2020(21).
- [2]贾康.“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之学理逻辑研究[J].河北

- 经贸大学学报,2021(2).
- [3]张倩肖,李佳霖.构建“双循环”区域发展新格局[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4]吕炜.财政与共同富裕:实践历程、逻辑归结与改革路径[J].财政研究,2022(1).
- [5]赵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的实践历程、逻辑进路与未来展望[J].新疆社会科学,2018(5).
- [6]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2015(4).
- [7]刘志彪,孔令池.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特征、问题及基本策略[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8]中共中央政治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6/content_5551828.htm, 2020-10-16.
- [9]姚树洁,刘嶺.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视角[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9).
- [10]王继源.武汉:从“内强外弱”向“内外高水平互促”转变[J].中国投资,2021(12).
- [11]迟福林,方栓喜.以高水平开放打造双循环的重要支点:河南在国家新发展格局中战略地位的几点思考[J].区域经济评论,2022(5).
- [12]余东华,王山.东西差距、南北分化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2(6).
- [13]李琼,张耀军.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高质量发展[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13(2).
- [14]冯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成本管理机制构建[J].会计之友,2021(1).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He Hui Liu Shuming

Abstract: It is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o construct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hereby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can boost each other, with the domestic market as the mainst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al evolution, the dual circulation conforms to the basic la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build a dual-cyc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 in line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strai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Therefore, 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locking points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should be broken down. At the macro level, we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unified big market to provide basic support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t the middle level, each region should not only integrate and cooperate for “group development”, but also determine differentiated strategic goals of economic cycl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ndowments. At the micro level, we shoul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effective market and productive government,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责任编辑:文 锐)